

辞书研究

2

1980

C
I
S
H
U
Y
A
N
J
I
U

辞书研究

1980年第二辑

(总第四辑)

1	陈 原	释“一”
20	杭 苇	提高质量和解决矛盾
268	周锡荣	马克思、恩格斯和《美国新百科全书》
32	吴景荣	编写《汉英词典》的经验与教训
42	严庆禧	编纂《德汉词典》的一些体会
51	徐锡祥	《法汉词典》编后琐谈
58	顾柏林	双语词典的翻译和配例问题 ——《汉俄词典》编写的一些认识
68	李锡胤	双语词典的灵魂——语义对比
87	王淑馨	双语词典中成语、谚语的翻译
97	黄建华(编译)	法国辞书的编纂与出版 ——词典编纂问题([法]罗贝尔作) ——法国词典学一瞥 ——一座语言的丰碑:《法语宝库》简介 ——拉鲁斯出版社漫笔

135	〈资料〉 《法语宝库·导言》(徐志仁译) ——关于释文 ——关于词例 ——资料的补充
156	法国的主要辞书(伊扬辑)

158	符淮青 词的释义方式
170	苑育新 略谈辞书的解说和书证
181	张双棣 论假借
193	郑远汉 谈“同训”

辞 论 杂 谈

199	王知伊 谈谈语录的引用
201	钱永之 朱若溪 “飞蛾赴火”的释义和书证
203	陈中绳 从“腰酸背痛”说起
205	张浩逊 一个“参见”词引起的感想
206	陈炳迢 要求文字协调
207	谢 轶 小型辞书要有插图
208	克 怀 编写辞书应有一个固定常设班子
210	穆 揆 应当查查词典

问 题 正

211	谢自立 尊重语文词典的特性
219	鲍克怡 再讨论语文词典的阶级性问题
233	钱剑夫 我国古代的虚字辞典
246	史金波 简论西夏文辞书

261	夏光芬 试谈《歇后语词典》的编纂要点
280	方厚枢 建国三十年来出版辞书编目(续一)
辞 书 之 窗	一批编写中的词典:《鲁迅大辞典》(19)《土木建筑工程辞典》(67)《英汉视听词典》(155)《辞海·语词分册补编》(86)《汉语外来词词典》(86)《中国戏曲曲艺辞典》(192)《世界地名辞典》(279) 最近出版的词典:《遗传学词典》编译本(180)《日汉铁路词典》(198)《简明农业词典》第一分册(245)《简明畜牧业词典》(245)《日本姓名词典》(267)《新日汉词典》(267) 一些国外词典:美国出版《现代中国百科全书》(96)意大利出版一种图片为主的百科全书(126)
答 读 者 问	什么是模糊语言学等二则

辞书研究 第二辑

1980年6月

编辑者: 辞书研究编辑部
上海陕西北路457号

印刷者: 上海市印十二厂

出版者: 上海辞书出版社

发行者: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书号 17187·33

每册定价 0.77 元

释“一”

——关于词典收词、释义的若干随想

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副主席

陈翔

一

“一”是汉字中笔划最少，结构最简单，最常用和常见的字，有点象拉丁字母表中的第一个字母a。小学生上学，拿到语文教科书第一册，翻开第1页，读第一课——他最初遇到的一个汉字（不一定是第一个）就是这个“一”。在按部首排列（或者说，不用号码、音序或笔形排列）的词典中，“一”字总是排在第一页第一个位置上。《辞源》，《辞海》以及它们历次的修改本，都是这样安排的。一千几百年前许慎编《说文解字》，“一”字也是放在“第一”（上）的第一项。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一”的一般用法、含义，好象是什么人都说得出来；但是“一”的特殊用法、含义，那就不一定了。至于以“一”字作为字头所构成的语词和术语，那就更多了，它们的含义也就不一定一看就懂了。所以，一部字典（词典）该收那些字，那些词，不收那些字，那些词，收多收少，解释到什么程度，这都要按照这部词典的方针任务和规模，分别情况作出规定，不能简单地一刀切。

象“一”这样的常见字、常用字，仿佛谁都一看就懂得的字，收不收进语文词典，曾经发生过一场争论。在实践中，这个问题是解决了的，那证据便是：没有一本词典不收“一”字。在动乱的十年间，特别是当一些不搞语文，完全不研究语词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

律的同志们进入词典编纂领域时，这样的争论在不同的场合里曾经进行得很热闹。当时代表“革新”者的一派意见，认为词典不应收常见字(词)。“谁会在字典里查个‘一’字呀？”可也是。当时代表“守旧”或“复辟”者的一派意见，认为既是词典(或更准确地说，一般语文词典)，什么字都应当收，“一”字也不例外。前者激烈反对，说，一呀，二呀，三呀，四呀，人呀，手呀，桌椅板凳呀，葱姜油盐呀，这些字或由这些字构成的词，如大葱，生姜，菜油呀等等，以至老师，学生，爸爸，妈妈之类，都不必收在字典(词典)里——他们那时把问题一下子提到阶级意识和阶级斗争的“高度”来阐述。比如说，只有地主才分不清什么是大葱，生姜，贫下中农对这些词儿太熟悉了，用不着查；因此，如果一部词典收进这些据说只有地主才不知道的词儿的话，那么，这部词典就不是为工农兵服务，而是为地主阶级服务，从政治路线上说，这就叫做复辟，等等。这种“理论”自然是荒谬的，是一种“极左”思潮的表现；但如果平心静气地从学理上探索词典该不该收最常用的字(词)这个问题，倒也确实是可讨论的。

我是收录派。在几次会议上我发表过意见，后来综合起来收在我那篇《划清词典工作中的若干是非界限》(见《中国语文》1978年第一期)里，但那里比较多的是从政治上立论的，我想，还可以从词典编纂学的角度加以阐述。我以为，在一般(通用)语文词典中应当收录最常见的字(词)，有几层意思：

头一层意思，词典(字典)是语言现象的记录——或者说，词典(字典)是人类社会语言现象中特别是其中词汇现象和表现法的记录。这里所谓记录，包括整理的意思在内；不是单纯的机械“记录”。凡是社会语言中拥有的词汇，都应当不分它的难易或常见程度，收进词典(字典)中去；当然，要按对象和规模来决定所收词汇的范围和数量——但是数量的起点不是多少生僻字，而是常用字。词典不是专门论文，它没有权利排除习惯用的语言现象，正相反，它只能按照一般的以及特殊的规律，来阐发或解释这种即使是最常见

的语言现象。因为它的任务是对特定范围的社会语言现象的系统描述,整理和加以规范化。词典也不是语文课本,语文课本可以按照教育方针和主编者(们)对这个方针的见解,定出该给多少汉字,该给那些汉字,以及该阐明那些汉字中的那一个义项,课本完全有这种权利;在不同时期或不同主编者主持下的语文课本,可以对语言现象作不同的处理,至于那种处理更有用些,可以让实践来检验。词典不能作出象课本这样的选择。无宁说,词典要记录、描述、整理较为一般的、大范围的语言现象,不管主编者愿意不愿意。当然,毫无疑问,语文课本所给出的汉字和词儿和表现法,首先是从常见和惯用入手的;排除常见和惯用词汇来编初级、通用、一般语文课本,这是不可能的,编出来也是不实用的。在这一点上,词典(字典)也是不能完全排除常见惯用的语言因素的。

再一层意思。所谓“常见”,“常用”的概念,有些是全民性的,譬如“一”字,大人小孩,没有不知道的;有些却不是全民性的,譬如上面提到过的类似“大葱”“生姜”的词儿(注意,我是说“类似”)。往往有这样的情况,这部分人常见习用的,那部分人不常见不习用的;这部分人不需要查字典的,那部分人需要得很。这是由于社会生活是很复杂的,发展是很不平衡的,差别是客观存在的,所以发生在我以为常见,在别人就以为罕见。讲到这里,我就不能不回忆起十年动乱期间一桩事。某地把英语教师连同学生拉到农村去,让教师把农村中惯用的农具和农家生活用具译成英语教给学生,什么箩箩筐筐,坛坛罐罐,耖耙铧耩,条播、点播、撒播之类,当然这位同志一时找不到英语的等义词来对译,于是某些人们就哈哈大笑,证明所谓“理论脱离实际”,最后证明“臭老九”无用——我当时看了,听了,确实很难受。我想莎士比亚那么大的词汇学家被拉到这样的场所去,也只能瞠目结舌的。因为这部分词汇他不熟悉。同样,城市里的孩子都知道什么是电视,频道,天线,煤气,液化石油气,暖气,冷气,空调,电冰箱,半导体,诸如此类;目前的农村,很多大人都说不清这些是什么东西,别说小孩子了。为什么?因为他

们的生活环境不同；他们的生活环境同城市生活环境有很大的差别，记录反映这些生活环境的词汇，就不能不被一部分人所常用，而被另一部分人认为罕见。因此，一部词典的编纂者，很难准确地区别、判断出所有的字和词，说明那个词是全民常用的，那个词是那一集团的人群常用的。对于词典编纂者来说，全民常用的或一个集团人群常用的字或词，当然要经过调查研究，推理分析，做到心中有数，但是在通用的一般语文词典中，编纂者只能把它们通通收进去，以便不常用的人可以在这上面找寻到他所需要的信息，而不能有别的选择。或者说，作出别的选择（例如在一般公用词汇中去掉所谓常用语词），只能招致片面的效果，实用价值是值得怀疑的。

还有一层意思。汉字中某些常用的字和词，往往具有罕用的僻义——如果词典不收这种僻义，尤其是中型或大型语文词典不收这种僻义，那么，词典就很难起到它的被人查考的作用。还是以“一”字作例。《老子》里“道生一，一生二，”其中的“一”，在当代是僻义，是很费解的，《辞海》新版释为“这里的‘一’指从无形的道派生出来的混沌之气”，这释文也是不易解的，可能它拘泥于道德经，也只能这样解释。说“一”就是“混沌之气”，那么，下文“一生二”，混沌之气又生出什么来了呢？这类东西，恐怕只能在中国哲学词典这类专科词典或百科全书中来寻找妥贴的释义了，不能苛求于语文词典（那怕是大型的兼有百科性质的语文词典）。我在这里举这个例，不过是论证最简单的最惯用的字（词）有时会引起很不容易解释的特殊意义，不要忽略了这一点。

再一层意思。“一”字虽然常见惯用，但是词典有义务去综合描述或记录这个常用字的多种表现形式——而这多种表现形式中，有些是为人忽略的，有些是某一层人（例如年青人）所没有注意到的。我欣赏《辞海》旧版中的这么一段解释：

“按一，近世公牍帐簿记数多作壹，商码作1，阿剌伯数字作1。”又说：

“乐谱表示声调之名称，或作乙”。

“注音符号韵符之一，读如衣，单韵。”又，“本韵符写法有二：竖行作一，横行作 l，国语罗马字母为 I。”

这里给出的信息是很有趣的：

一 = 壹 = l = 1 = 乙(乐谱) = 注音符号(竖行) = I (国罗字) 如果还可以给信息的话，则作为数码符号的“一”，在罗马人来说，
= I (大写的拉丁字母)。

我说这些信息是“很有趣的”，就是说，词典往往是(或者在某些场合是)有趣的读物，它常常会给出人们习惯上忽视了或遗忘了的信息。例如当代青年人不大习惯帐簿用字(也称为“大写”数码)，但是现实生活，写张收据之类，又常常要求用这种字，当他不知道或忘记了“一”字的帐簿用字(大写数码)时，一查字典，得到“壹”的信息，他是多么高兴呀，他就说：这部词典真有用——于是他从心底里感谢词典的编纂者。我说“有趣”，就在这些地方。

顺便想到一个问题。汉字有它独特的形体发展的历史，因此，在大型的通用汉语或者大型的古汉语字(词)典来说，(例如在编辑中的《汉语大字典》，和已出版修订本第一册的《辞源》)，值得考虑在每个汉字下面收载能够搜集到的形体变化，比方甲骨文、金文，钟鼎文，大篆、小篆、草书，等等方面的材料，这对于研究和解释汉字内在的特殊规律是有重大意义的。日本人诸桥辙次在他的十三卷本《大汉和辞典》中这样做过了，(瑞典人高本汉 [Bernhard Karlgren] 的词典显示的是音值变化 [时代的和地域的])，张瑄在香港出版的词典也在字形方面做了一点工作^①。我以为字形的变化很值得词典界的重视，在某一种意义上说，甚至比音值的变化，更为当前使用者所欢迎。我们的汉字的字形直到现在还不断在变化着，我指的是简化字。有时是群众在那里促它变化，有时还得加

① 诸桥辙次：《大汉和辞典》(全十三卷)，1941，大修馆。Bernhard Karlgren: 《Analytic Dictionary of Chinese and Sino-Japanese》，vienna. 张瑄：《中文常用三千字形义释》，1968，香港大学出版社。

上自上而下的行政力量(即规范化的努力)。

汉字字形的变化同释义有若干内在的关系,这本来是文字学的范畴,但是在词典编纂学上它也是需要认真考虑的。这一点,同使用字母拼音的文字不同。拉丁系统也好,斯拉夫系统也好,作为拼成单字的基本材料——字母,不过二十几三十几个,展现这几十个字母形体上的来源和变化,是比较容易的,所以西方一般语文词典里很少注意字母形态的变化。无论牛津系统的词典,还是韦伯斯脱系统的词典,对此都是不予论列的。麦美伦公司 1974 年出版的一部《学校用英语词典》^①,二十六个字母都有它的渊源,有点象我们的文字源流那样的味道,是很别致的——比方 A 字下列举了 1. 闪语 א א, 2. 腓尼基语 א X, 3. 早期希伯来语 א, 4. 公元前九世纪希腊语 Α, 5. 公元前八世纪希腊语 Α Α, 6. 英语 A, 还有一段简洁的很有启发的说明。这样的释文是在当代西方语文词典中不多见的。至于我们汉语,眼前还没这样的词典,而我和一些对语言文字有兴趣的同志,包括我所曾接触过的某些中学语文老师,都盼望有这么一本词典。

二

接着要阐述的一个问题,是释义的排列次序——这个问题是词典界所熟悉的,在不同时期引起过争论的问题。我想用一本词典的两个版本对照一下,即《四角号码新词典》第七次修订本(62年)和第八次修订本(77年)。前者列七个义项,后者列十一个义项。请看:

① 数目名

① 数目字

② 统括全体的词(一切,一概) ② 专一(一心一意干革命)

③ 划一(统一)

③ 满,全(一屋子人)

^① William D. Halsey: «School Dictionary», 1974, New York, Macmillan.

④ 专一(一心一意)

⑤ 同样(一色一样)

⑥ 另外(一名,一说)

⑦ 每逢(一想,一听)

④ 划一(统一)

⑤ 相同(一样)

⑥ 另外(一名)

⑦ 稍微(看一看,谈一谈)

⑧ 与“就”呼应,每逢(天一亮他就起床)

⑨ 乃,竟(一至于此)

⑩ 放在“何”字前,表示程度深(一何怒)

⑪ 旧时乐谱记音符号之一。

第七版有7个义项被第八版沿用了,第八版增加了4个义项(即⑦,⑨,⑩,⑪),其中两个基本上不是现代汉语的释义(⑨,⑩),还有一个是音乐符号(⑪)。增加这几个义项,使“一”字得到更多的释义,有助于阅读非当代文体的书籍,这当然是可以的。我想提出的问题是,这些义项的排列,在两版中有所不同,有什么非这样改动不可的理由吗?这就是排列义项的原则问题。大约词书义项的排列,基本上是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按历史语言发展的顺序来排,最原始的意义放在最先,然后逐步发展,当代的使用法则放在最末项。如英国牛津大字典(O. E. D.)①就是这样办的。另一个极端是按常用的频率来排义项先后,用得多的,排在前,用得少的,排在后,现代有号称用计算机来计算每个字每个义项的使用频率,然后排列的——我写上“号称”,是表示这里面有吹嘘之意,似乎不是每一个字每个义项都经过这样周密的调查的。人们说美国“任意”出版社(Random House)的英语词典②中关于义项频率的调查,是利用了计算机的。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当然可以有种种弹性,但大体

① 这部词典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原名叫做《A New English Dictionary on Historical Principles.》,“按照历史原则”来编纂的新英语词典。

② 指《The Random House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据说它使用计算机来调查某些单字义项使用的频率。例如 terrific 一字,经过调查,认为现代用法,多半作 extraordinary great or intense (十分,极其)解,故把原义 terrifying (可怕)排作第2项,将常用义排为第1项。

上以常用的词义放在前面，僻义放在后面，是得到读者欢迎的。至于专门以研究语源为任务的词典，又当别论。《四角号码新词典》第八版改了第七版的几个排列次序，如②变③，③变④，④变②，看来是说不出什么重大理由的。如果没有重大理由，一部词典的修订本最好还是按原本来排列。因为是在修订，而不是新编。我们过去的词典很少经常进行修订，这个问题还不突出，今后我们的政治环境稳定了，修订的工作就应当而且可以经常地进行，这就必须严格遵守一条规矩：原来错的，把它改正；不错的，就不要另出心裁去改；原来不够确切的，把它改得更确切些，这叫做精益求精，而不必硬是为改而改，更加不能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而突出增加一些口号式的东西，这是有害的。有一部词典编了二十年，编纂者弄得痛苦难当，为什么？每一次运动都带来一次大修改，结果语文质量没有提高，只是政治口号式的东西变来变去。有时实在很可笑的。比方文化大革命一来，就拚命的去批所谓阶级斗争熄灭论；于是词条立了，释义也按此胡诌了，举出用例也是漫骂式。今天骂某甲为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明天某乙倒了，又骂某甲、某乙通通都是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然后某甲平反了，又改为只剩下某乙在鼓吹。历史随便你去揉，爱骂谁就骂谁。有一部词典按当时的“风尚”，大批“林彪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试问林彪是以极左面貌起家的，他把一切都提到阶级斗争的“高度”，你这释义从哪里说起呢？到“四人帮”被粉碎，又换一下“时装”，改为“四人帮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这行吗？编辑当然不要做“风派”，词典编辑更绝对不能做“风派”；当词典编辑成为“风派”时，他不但害了读者，也害了词典本身，叫做害人害己。话说回来，修订词典要尊重前人的劳动，要尊重历史，要讲求实效。

三

“一”字项下，《四角号码新词典》第七版收 68 条，第八版收 90

条,《现代汉语词典》修订版收 259 条;《辞海》新版收 244 条;《辞源》修订版收 450 条。所有这些词目,都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语词的,包括熟语,成语,习用的片语,常被人引用的“警句”(外国人专门编印“引语词典”^①);另一个方面是百科性的,包括人名,地名,事件,常用的专科术语,等等。即使是专门处理“现代汉语”的词典(如《现代汉语词典》),或专门处理“古代汉语”的词典(如《辞源》修订版)也不例外。这是中国近代词典的特点。近代出的两大辞书,《辞源》,《辞海》,都跳不出这框框。也许因为近代中国客观上需要各科知识,不能满足于纯粹讲字形,字音,字义以及纯粹语词方面的内容,这样,近代汉语词典就包罗了比较多的知识性词目,也即百科词目。这就是我们词典界口头常说的“以语词为主,兼及百科”,也即是说:兼有点百科全书、百科事典的味道。保持这种特色,没有什么坏处——至少对于目前中国来说,是大有好处的,因为我们大抵是知识贫困而且手头又不那么自如,一本书最好兼有多种用途。看来,即使中国大百科全书相继出版以后,汉语词典的这种特色还是要保持下去的——严格地说,词典对百科术语的释义,同百科全书相比,应当是不一样的,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此处不想多所论列。以上讲的是词条的构成。当然,每一部词典因为它自己有不同的对象,不同的方针,不同的目的,这个构成(特指语词与百科的比例,以及收列那些“百科”词目等等)可以而且应当不是一样的。

① 引语词典,在西方国家有不少。例如廉价本企鹅公司的《企鹅引语词典》(The Penguin Dictionary of Quotations)。这部词典的前言说,引语词典必须有三个用途:一、使读者借助索引能查出他头脑中隐约记得的警句、名言的原文;二、使读者能查出某句名言的出处,版本,页数等;三、使读者借助索引能查出有关某一特定主题的警句和名言。例如伽利略的名言“但是它(地球)确实在转动呀”,在 164 页可查出该警句是宗教法庭迫使伽利略放弃地球绕太阳转动时说的话。查出伽利略生卒年为 1564—1642,查出此言的拉丁文原文和英语译文。

不论是语词的释义，还是百科词目的释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百科词目的释义），最重要的问题是：要用最简洁明白的语言，来解释错综复杂的现象。废话是不需要的，套话是使人厌烦的，空话是没有信息因而也是毫无效果的，一般不需要的形容词、副词之类的东西是多余的，多余的话对词典来说是一大忌。词典的释义，要用事实说话。当然，在选择和提供事实时，以及描绘这些事实时，无论如何是需要有倾向性的，可是，词典应当提供必要的事实与论断的同时，给查阅的人留下思考的余地，须知人们不用脑子是学不到东西的，是消化不了信息的，即使查词典所得的信息也不例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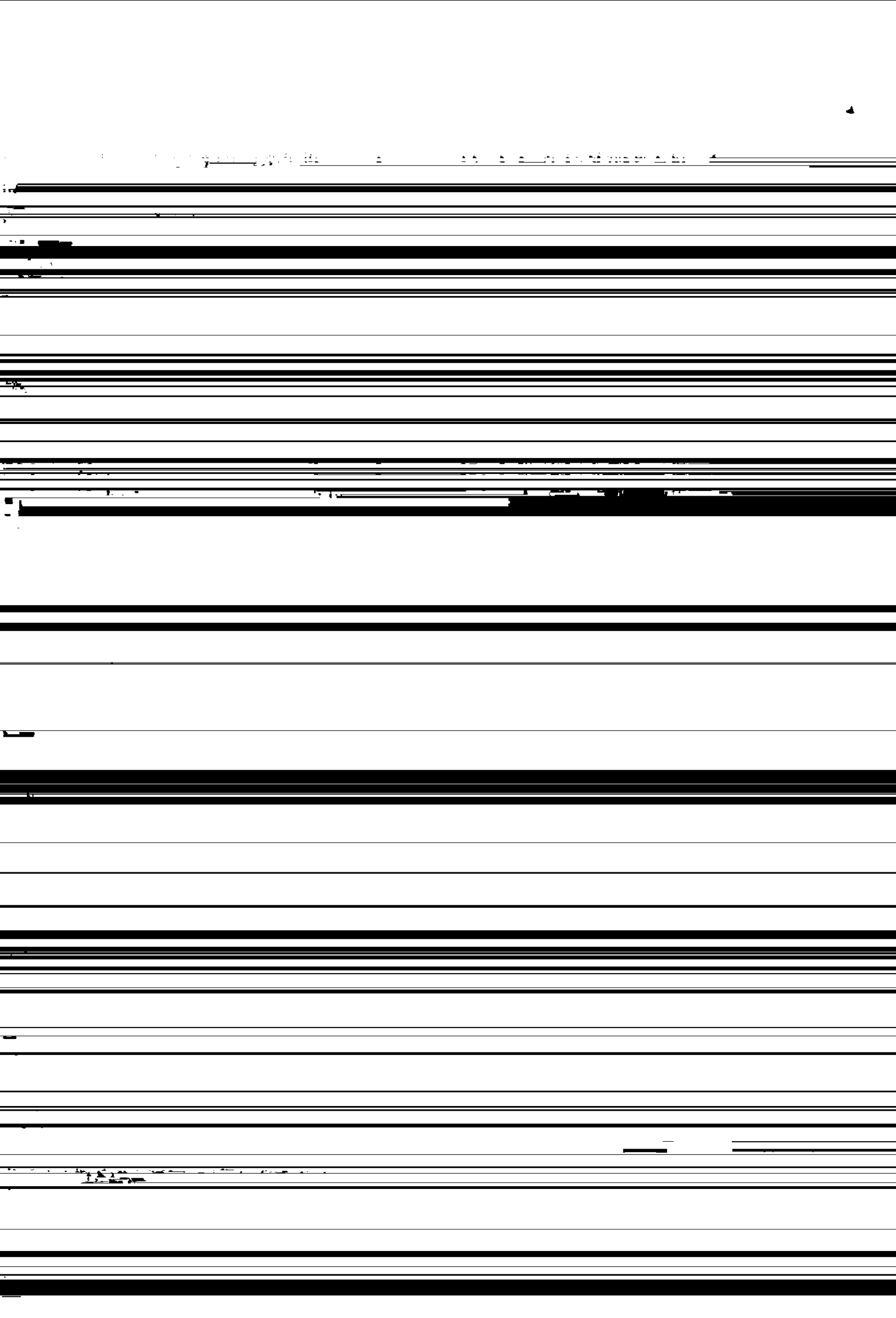
前些年我曾广泛作过些口头调查（虽则不是有系统的），我发现人们对《四角号码新词典》的释义，一般地说是欣赏的。人们欣赏它短，简单，明白。在第七版以前的这部词典，尽管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每条词目的释义就是只占一行或两行的地位，用几个字，十几个字，最多几十个字，把这个词目的要义（主要的、概括的、一般人日常所应掌握的意义）提供出来了。这是一种功劳，很不容易的。专门家责备它们不够周全，很对，从专门家的角度，完全可以作这样的责备；但是一般读者宁愿要这样的释义，尽管是不完全的释义。“一六〇五”，一查，他知道是一种杀虫剂，知道是一种农药，充其量知道是制造这种剂的研究单位编号为 E-1605，故名“一六〇五”，一般场合下对一般读者来说，这就够了——当然这释义还没有给出最科学的概念。《辞海》新版只用了 24 个字：

“一六〇五。农药名。德国研究单位内部编号 E-1605，故名。即对硫磷。”

我欣赏这个释义。我认为这个释义对一般读者来说，是给出了全信息的。比方说，从一篇小说看到“一六〇五”这个词，不知道它确切是什么，一查，知道了，这就是全信息。自然，即使 24 个字的释文，仍然可以简化，比方说第二句中的“内部”编号的“内部”两字，就可推敲，至少这个信息是不太需要的。反正它是一种编号，是德国的，研究单位的，一种序列号，至于是内部还是外部，一般读者也

无需深究。当然，你要了解多一些，在“对硫磷”这条词目中可以查到。《辞海》未定稿，详细释义在“一六〇五”条，而简义在“对硫磷”条，新版则相反。我以为新版是比较妥当的，因为“一六〇五”只是一个代号，只须知道是什么东西——是农药，而不是别的什么——就够了，但“对硫磷”则是一个学名，或者说是一个专门术语，因此应当提供科学的信息。但是我们的词典（特指大型词典）有一个弱点或缺点，往往不标出“参见”的符号，或者标出的不够多。其实在这个释义的最末一句“即对硫磷”末尾，比方说加一个“*”号，表示欲知其详，可检查带有*号的词目，那就功德无量了（《辞海》有*参看符号，这条可能是漏列了）。这在西方学术索引方面叫做“交叉”参考、检查“交叉”索引之类（Cross-reference），不可少的。外国有的词典用“参见”，中文词典有时也有“参见”某某条，我以为不如用规定的符号更节省篇幅。

《四角号码新词典》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紧张和动态，不知从那一版开始——也许第六版（58年）开始，到第七版（62年）更加厉害，这与当时（58，62年）的政治形势比较紧张有关。那时将一些政治词目（或带有政治性的词目）修订得十分“详尽”，尽量地拉长，尽量地多说一些，尽量地把一些政治概念塞到那里面去，因此任何人一翻开这部词典，都会得到一个明显的印象，政治性词目释义都是长得啰嗦不堪，而其他词目（以及一些政治性不那么强的词目）都相对的简洁，总之是很不相称。完全不能责备词典的编纂者们——请替他们设想一下，如果不那样做，会给自己或给这部书带来什么后果。“突出政治”，“为政治服务”，“政治第一”，诸如此类的口号、号召、政策，那时都是深入人心的。不那样办不行。突出的例子可以举出“修正主义”一条。58年第六版这一条占十行，已等于一般词目的十倍或五倍；62年第七版占二十二行半，又增加了一倍有多。到77年修订本即第八版，又恢复到十行。在那样一种空气压力下，人们不习惯于用朴实的语言，开门见山地提供必要的事实作为释义的主要点，却是不能不重复一套谁都可以背诵一百遍的陈



按其内容来说，几乎是完全一样的。这不奇怪。这反映出我们是一个社会主义社会——我们的意识形态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针的。这说明了一个问题，即，词典中的成份（单字，词儿）是没有阶级性的，但是编纂词典的人是社会的一员，他不可能不带着社会性（即他的观点，他的立场，他的态度等等）。这样，词典在特定的场合——比如在对哲学用语的释义上——就不能不带有阶级的烙印。

现在让我们来考察一下三部词典对“一元论”的具体释义。我们马上会发现，三条释义的导语是完全相同的，“认为世界只有一个(种)本原的哲学学说。”只差一个字，两本用“一个本原”，一本用“一种本原”(这个字当然是有考究的)，但就本质来说，三种释文导语可以说是完全一致的。

持“一种”的释文，是《辞海》新版，就其下文来说，顺理成章，无可非议。释文中主体的部分是阐明有两种一元论这个概念，三种释文对照起来是：

《四角》	《现汉》	《辞海》
一元论有两种，凡认为物质是世界本原的，是唯物主义一元论；硬把精神颠倒为世界本原的，是唯心主义一元论。	认为物质是世界本原的是唯物主义的一元论。认为精神是世界本原的是唯心主义的一元论。	肯定这种本原是物质的是唯物主义的一元论；肯定这种本原是精神的是唯心主义的一元论。

如我在上文所指出的，三种释文几乎是相同的，在字面上也都有所斟酌，我想暂时不在这里推敲这些微小差别。我想提出的一个现象是，把一些不必要的，或者更准确地说，把一些就上下文来看，不加上也就能看得懂(所谓“其理自明”)的字或句放在释文中，是完全不值得称赞的。上举第一种释文，“一元论有两种”，这个短句在词典的释文中是完全可以省略的，因为你看下去会碰到完全相对的(对应的)两个概念，你立即会总结为有两种一元论的。加这